

新形势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动力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以南充市S村为例

甘麒¹ 王妍²

1 西南石油大学，四川南充，637009；

2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9；

摘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已成为实现农村善治的核心路径。本文以四川省南充市的一个典型村落——S村为研究案例，通过实地考察与实证分析，系统梳理了该村在强化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兴旺、倡导乡风文明、着眼生活富裕四个维度的具体实践。文章旨在深入剖析其“组织-产业-文化-民生”四位一体的实践逻辑，揭示以政治引领为核心、内生发展为导向、文化认同为纽带、多元协同为保障的动力机制。同时，针对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合作项目风险与自身产业脆弱性等挑战，本研究从强化风险抵御能力、深化产业内涵、完善治理体系等角度，提出了具有普适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同类地区在新形势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关键词：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实践逻辑；动力机制

DOI：10.64216/3080-1516.25.10.056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而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则是这一战略能否落地的关键。“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党的领导是实现“三治结合”的根本保证。新形势下的乡村治理，面临着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的深刻转型。在此过程中，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优势，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文选取南充市S村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该村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其治理实践完整地体现了党建引领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到具体产业推动的全过程，既有显著成效，也面临现实挑战。本研究并非简单的经验总结，而是试图通过对S村实践的解构，提炼出其内在的实践逻辑，剖析驱动治理变革的动力机制，并基于发展瓶颈探索未来的优化路径，从而形成一个从“怎么做”到“为什么能”再到“如何更好”的完整学术分析框架。

1 S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回答的是“行动是如何系统展开的”问题。S村的实践并非零散的措施堆砌，而是构成了一个以党建为轴心，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的有机系统。

1.1 组织重塑逻辑：从“软弱涣散”到“坚强堡垒”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乡村治理的根基。南充市S村的实践首先始于对党组织的系统性重塑。

1. 思想铸魂，凝聚共识。通过由驻村队员牵头组织的“缅怀先烈践初心 凝心聚力促振兴”等系列主题党日活动，超越了传统说教，将理想信念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具体使命相结合，实现了党员思想从“被动接收”到“主动践行”的转变，为治理行动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阵地赋能，空间再造。新建成的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升级，更是一个多元化的治理枢纽。在此进行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讲，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村民可感知、能理解的行动指南，使阵地成为连接国家意志与乡村实践的“转换器”。

3. 队伍淬炼，能力提升。通过“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结对帮扶”并建立台账，实现了外部智力与内部组织的深度融合；组织村两委成员赴周边先进村学习考察，则打破了地域局限，引入了对标学习的“鲶鱼效应”，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

这一逻辑链条的成果直接体现在“先进基层党支部”与“优秀党支部”的荣誉表彰上，标志着该村党组织已成功实现从“组织存在”向“治理核心”的团体身份转变。

1.2 产业驱动逻辑：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检验党建引领成效的关键场域。S村的产业驱动逻辑体现了“巩固”与“创新”的双轮并行。

1. 巩固传统，培育主体。立足原有的粮桑产业基础，重点培育村致富带头人、党支部副书记，由其负责蚕房桑叶收购工作。这一做法巧妙地将“党员”与“能人”身份合一，形成了“党支部+带头人+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在工作队协助下发放工资十余万元，使村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增收，极大地增强了党组织的威信。

2. 试点先行，激发微经济。为全村198户在家农户发放优质鸡苗，发展庭院经济，是上一年成功经验的战略延续。此举投资小、见效快、覆盖广，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户的短期收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激活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培育了村民的市场意识。

3. 探索新路，直面风险。尽管蔬菜基地合作项目因天气、劳动力等因素遇挫，高粱基地面临旱情威胁，但这些探索本身反映了党组织在产业多元化上的努力。其间的挫折恰恰揭示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复杂性与风险性，为优化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反面教材。

1.3 文化治理逻辑：从“陈规旧俗”到“文明新风”

乡风文明是乡村治理的柔性支撑。S村通过制度建构与宣传教育，推动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1. 组织化规范。成立红白理事会并制定章程，将移风易俗这一软性要求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硬性制度，为村民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引，有效遏制了铺张浪费、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

2. 持续性浸润。通过村民大会、走村入户等形式开展的260余人次宣传，并非一蹴而就的运动式治理，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文化浸润过程。这使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风尚得以逐步内化为村民的集体认同。

1.4 民生兜底逻辑：从“精准脱贫”到“共同富裕”

生活富裕是乡村治理的最终归宿。S村通过精准的民生保障网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1. 精准帮扶网络化。发动高校与村户结对，实施“一户一策”，将宏观的帮扶政策微观化、具体化。这种“点对点”的帮扶模式，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确保了帮扶的精准性与常态化。

2. 成果共享普惠化。文化院坝等项目的建设，让村民在精神文化和物质财富上获得双丰收，体现了治理成果由村民共享的根本原则，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3 S村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旨在揭示驱动上述实践持续运行的内在力量。S村的治理变革源于以下四种力量的协同作用。

3.1 政治引领力：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同频共振

这是最核心的动力源。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势能和政策导向。S村党组织精准地承接了这种势能，并通过主题党日、政策宣讲等方式将其转化为具体的乡村行动。同时，该村并非机械执行，而是结合本村实际进行创新，如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成立红白理事会等，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

3.2 内生发展力：外部资源与内部主体的有机结合

以驻村工作队为代表的外部资源注入，是初始的“启动器”。但S村成功的关键在于，没有形成“等靠要”的路径依赖，而是着力激发内生动力。无论是发放鸡苗激活庭院经济，还是培育本地致富带头人，其目的都是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催化内部活力的“酵母”，推动村庄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

3.3 文化认同力：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的融合重构

通过移风易俗和感恩奋进教育，村庄正在构建一种新的集体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既包含对节俭、互助等传统美德的回归，也包含对市场规则、契约精神等现代文明的接纳。这种新的文化认同，降低了治理的交易成本，为产业合作、公共事务参与提供了非正式的制度保障。

3.4 多元协同力：党政群企学的多方联动

S村的治理实践展现了多元主体协同的图景：党组织领导、村委会执行、驻村工作队智力和资源支持、高校支部结对帮扶、村民积极参与、市场主体参与合作。这种“党政群企学”五位一体的协同模式，打破了治理的单一主体局限，形成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治理共同体。

4 面临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尽管成效显著，但S村的实践也暴露出乡村治理的普遍性挑战，据此可结合实际提出比较合理的优化路径。

4.1 主要挑战

1. 产业发展的脆弱性：蔬菜基地项目受挫和高粱基地的旱情，深刻揭示了小农户经济在面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时的极度脆弱。缺乏完善的灌溉设施、劳动力短缺、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易导致产业项目失败。

2. 外部合作的不可控性：与外部承包方合作的蔬菜基地项目，实际利用面积远低于预期，反映出在合作中村集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对项

目的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不足。

3. 内生动力的可持续性：当前产业发展高度依赖驻村工作队的策划与高校的资源对接。如何在工作队撤离后，确保发展思路和动力的延续，培育出真正本土化、可持续的经营主体和管理人才，是长远发展的隐忧，保证人才梯度供应是长远发展的有利保障。

4.2 优化路径

4.2.1 强化风险抵御能力，构建韧性产业体系

(1) 基础设施先行：加快推进“农业水渠修复勘察”工作，争取项目落地，从根本上改善农业抗灾能力。

(2) 建立风险基金：建议从村集体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或争取上级专项资金，设立农业风险基金，用于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滞销的紧急情况。

(3) 深化产业链条：对“堰口人家”商标的使用，不能仅限于电商平台搭建。应规划向农产品初加工、品牌包装、品控标准等环节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议价能力，降低“谷贱伤农”的风险。

4.2.2 深化党建引领内涵，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

(1) 党建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将党小组建在产业链上，例如在桑蚕合作社、高粱种植基地、电商运营团队中设立功能型党小组，让党员在产业发展一线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 数字化治理工具的应用：充分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引入简单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对村集体经济项目、帮扶台账、便民服务等进行信息化管理，提升治理效率和透明度。

(3) 构建“利益共同体”：在未来的产业合作中，村集体应通过合同条款明确权责利，探索“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使村民和村集体成为项目的利益攸关方，而非单纯的土地出租者或劳动力提供者。

4.2.3 完善多元协同机制，激发持久内生动力

(1) 培育本土“新乡贤”：有意识地吸引本土大学生、退伍军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返乡创业，给予政策倾斜，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

(2) 固化高校帮扶成果：将“三下乡”活动从阶段性活动升级为长期合作项目，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产学研合作平台，使高校的智力支持制度化、常态化。

(3) 提升村民参与制度化水平：完善村规民约的执行与监督机制，可探索建立“积分制”管理，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遵守移风易俗的情况与集体福利分红等

挂钩，形成正向激励。

5 结论

通过对南充市S村的深度案例研究可以发现，新形势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是一个以组织重塑为起点，通过产业驱动、文化治理和民生兜底等多重逻辑交织演进的系统工程。其动力源于政治引领、内生发展、文化认同与多元协同四大机制的共同作用。S村的有效做法，在于其将党建引领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行动，并初步形成了内外联动的良性发展格局。

然而，乡村治理现代化道阻且长。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外部依赖与内生动力之间的张力，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考题。未来的优化路径必须从构建韧性产业、深化党建内涵、完善协同机制等方面寻求突破，推动乡村治理从“有效”走向“高效”、从“善政”走向“善治”。S村的经验与瓶颈，对于广大正处于振兴路上的中西部乡村而言，无疑提供了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宝贵参考。

参考文献

- [1] 张龙, 张新文. 统合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与运作机制——基于川西Z村的个案观察[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06): 88-99. DOI: 10.19714/j.cnki.1671-7465.2025.0082.
- [2] 崔晓芳, 顾爱华.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简约治理：意蕴辨析、张力呈现及调适路径[J]. 云南社会科学, 2025, (03): 179-188.
- [3] 王颖吉, 李红丽. 制造网红城市：文旅融合视域下网红城市建设与传播的内在逻辑与长红路径[J]. 当代电视, 2024, (12): 43-49. DOI: 10.16531/j.cnki.1000-8977.2024.12.012.
- [4] 李由, 黄可. 职场“异化奋斗观”的解析与应对策略[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06): 32-37. DOI: 10.13971/j.cnki.cn23-1435/c.2024.06.010.
- [5] 龚宏龄, 代满玉.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逻辑：基于农村“一肩挑”的考察[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3, (03): 79-89.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充市-西南石油大学市校科技战略合作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3XNSYSX0075）的研究成果。